

# 劳工汇款与劳动生产率提升

## ——基于金融发展调节效应的研究

武力超, 林 澜, 何春辉, 卓文康

(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基于金融发展水平对接收国劳工汇款生产率效应的影响机理,采用142个国家1980—2017年的面板数据和面板固定效应及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围绕“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对劳工汇款作用于接收国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展开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工汇款促进了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随着劳工汇款数量的增加,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促进作用减弱;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劳工汇款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越大,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对劳工汇款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更大;此外,考虑金融危机可能造成影响后的回归结果仍然稳健。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对各国如何合理运用劳工汇款、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劳工汇款;劳动生产率;金融发展;金融危机;技术进步;金融自由化;对外劳务合作;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061.3;F249.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0)05-0072-11

###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也愈加频繁,海外侨民经常将部分工资收入汇回本国。诸多学者对劳工汇款回国的原因进行了解释,如Lucas等认为,绝大部分的劳工汇款是“纯粹利他主义型”,即为了帮助自己的家属改善生活;同时,部分跨国劳工在国内仍有产业,其出国后需要有人代为管理和照看,这些跨国劳工汇款回国用于支付佣金代理费或是产业扩张投资需要<sup>[1]</sup>。发展中国家是主要的劳工输出国,随着跨国劳工数量的增加,劳工汇款已成为其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世界银行数据显示,由1990年的5260万美元到2000年的20430万美元再到2010年的297300万美元,前后增长了五倍多,规模仅次于外商直接投资,并超过官方发展援助(ODI)的两倍。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增长逐渐放缓,各国都面临转变增长模式、发掘经济新增长点等多项挑战。经济增长离不开生产力的进步,因此劳动生产率作为评价国家经济增长潜力或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成为各国经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就明确强调了“两个同步”的目标: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坚持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步。曹如中等在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中发现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以资本投资型为代表的日本等国经济陷入低迷,而依托信息技术产业的欧美国家依然保持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率,表明资本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提高劳动生产率才是释放经济发展潜力的关键所在<sup>[2]</sup>。因此,发展中国家能否利用数量可观的劳工汇款提高劳动生产率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首先从理论上分析劳工汇款与其接收国劳

**[收稿日期]**2020-0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5CJL052);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720171001);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6JJD790036)

**[作者简介]**武力超(1985—),女,山西太原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金融发展与企业创新,城镇化与城市发展,邮箱:wulichao1985@163.com;林澜(1996—),女,福建三明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何春辉(1999—),男,四川绵阳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卓文康(1998—),女,福建莆田人,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本科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理论与政策。

动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机制,进而基于 142 个国家 1980—2017 年的数据建立实证模型检验二者的关联效应。

Mckinnon 指出,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严重的金融约束和金融抑制现象<sup>[3]</sup>。许多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资金短缺,并不是因为缺少可以用来积累的资金,而是因为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导致资金成本较高。梁琪和滕建州指出,我国的资本存量较大,因此能够有效配置资金并且具有风险管理功能的金融体系的建立将在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sup>[4]</sup>。如今劳工汇款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汇款达到 7142.49 亿美元,其中移民员工汇回中低收入国家的款项约为 5542.18 亿美元,较 2017 年增长 4.44%,中国则以 683.98 亿美元的汇款接收额位列第二<sup>①</sup>。20 世纪 80 年代起,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开始向东南亚、非洲等第三世界国家输出。近年来,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国正逐渐向欧美国家输出部分高知识劳动力,已形成全球范围内较为全面的对外劳务输出格局。因此,研究如何利用这些海外劳工的汇款有效促进本国劳动生产率提高,探索一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对上述传导机制产生影响对于我国开展对外劳务合作、有效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前虽然有少数学者考察了劳工汇款对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但将二者的研究落实到传导机制的实证考察较少,尤其是纳入金融发展因素的实证研究仍有待丰富。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1)将劳工汇款对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落实到传导机制的研究中,创新性地探究金融发展对接收国劳工汇款生产率效应的影响机理,并且在理论上归纳金融发展影响上述传导机制的四个渠道,这可以丰富金融发展的相关理论研究;(2)金融发展指标的选取将考虑金融体系结构的差异,从四个维度对比分析金融发展指标在劳工汇款对接收国劳动生产率传导机制中的差异性影响;(3)劳工汇款将促进接收国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一国劳动生产率也可能反作用于劳工汇款的流入,考虑到这种双向因果关系可能造成的潜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将引入接收国交易成本和滞后期的劳工汇款作为工具变量,使用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研究,尽可能降低内生性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 二、文献综述

Lucas 和 Stark 从经济层面解释了大规模跨国劳工汇款流动的原因,将汇款分为“完全利他主义型”和“利己主义型”两类<sup>[1]</sup>。这是学术界首次在微观水平上建立模型对劳工汇款进行分析。此后,随着劳工汇款的重要性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该领域的问题。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影响劳工汇款流入的因素。微观层面,劳工汇款被认为是家庭内部贷款协议下的分期付款<sup>[1]</sup>,因此城市银行系统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工汇款手续的简繁以及所产生费用的高低,从而影响劳工汇款的流入量<sup>[5]</sup>;宏观层面上,国内利率水平、货币汇率、一国的政治稳定性以及海外移民的受教育程度是影响一国劳工汇款流入量的重要因素<sup>[6-7]</sup>。此外,相较于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是劳工汇款的“接收大户”。

第二,家庭如何使用劳工汇款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劳工汇款有助于国内人力资本的形成<sup>[8-9]</sup>。Lopez-Calix 等以萨尔瓦多的小型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平均 16% 的劳工汇款被用于投资,因此促进了国内小型企业的发展<sup>[10]</sup>。Quartey 和 Blankson 研究了加纳部分家庭的劳工汇款使用情况,发现其有增加消费的经济效应<sup>[11]</sup>。

第三,劳工汇款与接收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结论莫衷一是。许多研究认为劳工汇款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sup>[12-13]</sup>。Batu 研究发现当接收个体意识到劳工汇款是暂时性的,为了平滑生命期内的消费,他们会选择储蓄部分劳工汇款用于投资,这有助于资本积累,促进一

①数据来源:<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migrationremittancesdiasporaissues/brief/migration-remittances-data>。

国经济增长;然而,在此基础上 Batu 进一步得出持久性的劳工汇款对接收国长期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的结论,因为休闲是正常商品,持久性劳工汇款的收入效应缩短了工人工作时间<sup>[14]</sup>。Rao 和 Hassan 也认为劳工汇款与接收国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sup>[15]</sup>。

目前,国外文献中关于劳工汇款对接收国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少。已有研究尽管基于菲律宾的数据证明了劳工汇款对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sup>[16]</sup>,但没有在理论上阐释其中的作用机制。Barai 认为劳工汇款可以最优化国内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率,这与索洛经典增长模型的观点相一致,即劳动力的跨国转移会使国内富余劳动力减少,同时所转移的劳工的国际汇款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国内的生产资本,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sup>[17]</sup>。Mamun 等的研究显示劳工汇款对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正向作用,且这种作用在国家间存在差异<sup>[18]</sup>。

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劳工汇款时将金融发展水平视作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如 Mundaca 认为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很好地将闲置在接收家庭的劳工汇款转变为用于长期投资的资本,从而创造额外经济利润,促进经济增长<sup>[19]</sup>;Dramane 发现“利己主义型”的劳工汇款像外商直接投资一样对本国的金融发展很敏感,金融部门成熟度越高,其所接收的劳工汇款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明显<sup>[20]</sup>;Akobeng 指出金融发展使劳工汇款对于贫困率的降低效应更加显著<sup>[21]</sup>。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赖于丹尼森效应<sup>①</sup>、纯生效应<sup>②</sup>、鲍莫效应<sup>③</sup>,其中纯生效应起主要驱动的作用,丹尼森效应的贡献度次之,鲍莫效应贡献度最小<sup>[22]</sup>。纯生效应主要依靠行业内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而内部生产率的提高又是一个分工演化、技术创新和资本深化的过程。金融中介能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增强其流动性,同时金融发展使得金融机构能拓展融资渠道并降低金融服务的风 险,将高比例的储蓄变为生产性投资,促进资本深化<sup>[23]</sup>。反之,金融体系不完善将造成金融资源无法被充分利用,尤其是对于以内部融资为主的中小企业而言,外部融资渠道枯竭,将进一步造成储蓄资源的浪费<sup>[24-25]</sup>。可见,金融发展促进资本深化,不断提高生产的资本有机构成,使每个劳动者所推动的资本量不断扩大,纯生效应增强。而纯生效应又是驱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关键贡献因素,我们预测金融发展将影响劳工汇款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

虽然 Mamun 等试图将金融发展纳入劳工汇款影响劳动生产率传导机制的研究中<sup>[18]</sup>,但其仅使用私人部门获得的银行信贷水平作为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并且所使用的样本容量较小,分组回归的结果未能很好地解释金融发展水平影响的差异。在 Mamun 等研究<sup>[18]</sup>的基础上,利用跨国面板数据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劳工汇款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传导机制进行细致研究,将是本文实证部分的重点。此外,鉴于金融危机使金融结构体系出现短期逆转现象,新兴经济体金融体系结构变化的广度会小于金融体系结构均衡发展的国家<sup>[13]</sup>,本文将进一步考虑金融危机这一外生事件的影响,以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

### 三、理论分析

劳工转移以及其汇回国内的汇款通过多种途径影响接收国的劳动生产率。第一,用于生产部门投资的汇款能优化资本与劳动间的比率。由于大多数汇款接收国,如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等,都具有劳动力丰富但资本短缺的共同特征,因此这些国家的发展战略以提高劳动力的长期生产率为主。劳动力的跨国转移会减少国内市场的劳动力规模,而劳工汇款将增加经济体内的资本存量,所以大多数接收国会致力于从战略上将丰富的劳动力转化为资本,从而使生产资料与劳动者更好地结合,进

①丹尼森效应:表示因要素流动或投入权重的差异所引起的生产率变动,即不同行业间劳动再分配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②纯生效应:表示以基期产出或投入为权重计算的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按照基期产出或投入权重计算行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

③鲍默效应:表示在考察期内各行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和行业权重变动之间的相互影响,对整体劳动生产率变动的作用程度。

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用于教育和培训支出的劳工汇款可以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一方面,来自海外的劳工汇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了接收国对教育事业的投资,有效提高了居民的受教育程度。许多研究已经证实劳工汇款在提高儿童受教育率、降低辍学率、加大学校投资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sup>[8,26]</sup>。另一方面,由于大部分接收国的金融市场并不完善,收入的波动会对人力资本投资造成不利影响<sup>[27-28]</sup>。而跨国社会网络通过劳工汇款,提供收入多样化战略和替代应对机制来应对经济冲击,进而稳定接收国的收入水平,保证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因此劳工汇款通过人力资本的开发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三,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效应中,纯生效应起主导作用且主要依托于资本深化和技术创新<sup>[22]</sup>,而劳工汇款这类国际资本的流入为国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裕的资金支持,使企业有能力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了产业技术创新。同时,“利己主义型”的投资性劳工汇款扮演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似的角色,能直接促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刺激国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体现劳动者从事生产与管理的效率水平,R&D资本体现有形资本(机器设备等)的技术水平,劳工汇款所带来的这两种资本的增长将共同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sup>[24]</sup>。第四,用于消费的劳工汇款可以刺激国内总需求。海外劳工汇款这一财富转移过程,对本国国内的个人消费、储蓄和投资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居民个人和家庭消费的扩张会刺激国内总需求,根据凯恩斯经济增长理论,总需求的增加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由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劳工汇款将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接下来,本文将创新性地把金融发展引入上述传导机制的研究中。金融发展对接收国劳工汇款生产率效应的影响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总体而言,金融体系主要由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和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中介组成。金融发展水平越高,金融机构汇聚和动员劳工汇款等零散资金的功能越强大,而金融机构可以将储蓄存款再贷款给企业用于投资,从而形成“生产性资本”,对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sup>[29]</sup>。同时,绝大部分“利他主义型”的劳工汇款将成为家庭的闲置资金,一个完善且健全的金融体系可以充分地将这部分资金转化为储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可以选择最有潜力的企业进行投资,从而提高社会资金配置效率,提高平均劳动生产率。(2)从金融市场角度看,其发展程度在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的传导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金融市场的完善意味着企业不仅可以通过金融中介机构进行间接融资,还可以在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这对于多样化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起着积极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增加研发投入、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自身在行业中的竞争力,而技术创新恰恰是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推力。(3)从金融中介效率角度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中介仍在金融体系结构中处于主导地位。随着金融业竞争加剧,各金融中介为了获得持续性的收益将会不断优化服务、提升效率,这有利于简化汇款交易手续、降低劳工汇款流入过程的交易成本,进而使劳工汇款数量增加,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作用也将更加明显。这种以银行为代表的广大金融中介伴随金融发展表现出的效率变化有利于加强劳工汇款对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4)从金融中介规模角度看,规模较大的金融中介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有效地进行风险管理,并提供持有分散化投资组合和增加资产流动性的机会,因此那些回避高风险、高收益的“利己主义型”劳工汇款的数量将大大增加<sup>[20]</sup>。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金融发展将对劳工汇款作用于接收国劳动生产率这一传导机制产生影响,金融发展通过与劳工汇款的互动作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

## 四、研究设计

### (一) 模型设定

本文选用142个国家1980—2017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劳工汇款对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并创新性地从金融发展角度将金融发展纳入上述影响的传导机制的研究中。根据研究主旨,本文的模型设定如下:

$$LP_{it} = \alpha + \beta REM_{it} + \gamma FD_{it} + \lambda FD_{it} \times REM_{it} + \theta Controls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i$  和  $t$  分别是指国家和时间,  $LP_{it}$  表示国家  $i$  在时间  $t$  内的国内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REM_{it}$  是反映一国收到的劳工汇款数量的变量,  $FD_{it}$  是一国金融发展指标, 本文将从流动负债与 GDP 之比、股票总市值与 GDP 之比、银行税后资产收益率以及银行存贷比四个维度进行衡量。  $FD_{it} \times REM_{it}$  表示金融发展指标与劳工汇款的交互项,  $Controls_{it}$  是一系列的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t}$  是随机误差项。

## (二) 变量描述

###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一国的劳动生产率 ( $LP$ )。吴进红和张为付指出劳动生产率的计算方法主要分为两类<sup>[29]</sup>: 一是传统的劳动生产率计算方法, 即以劳动创造增加值 (单位为元) 作为产出, 以劳动投入的实物量 (单位为人 \* 年或人) 作为投入, 得出的劳动生产率单位为元/人 \* 年或元/人; 二是参照资本生产率计算方法, 将劳动投入的实物量换算为价值量, 劳动生产率单位为元/元。目前学术界仍广泛使用传统的计算方法, Mamun 等、Polemis 等均以人均真实 GDP 作为衡量劳动生产率的指标<sup>[18,30]</sup>。本文采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形式, 并使用按 2005 年不变价格计算并经人均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一指标来衡量。

### 2. 主要解释变量

(1) 劳工汇款的流入量 ( $Remit$ )。根据上文的文献综述以及理论分析, 劳工汇款与接收国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关联, 本文使用接受国劳工汇款占 GDP 的比重来衡量劳工汇款流入量。

(2) 金融发展 ( $FD$ )。本文借鉴武力超的研究, 选取金融发展的指标时考虑到金融体系结构的全面反映, 既有反映银行发展状况的指标, 也有反映股票市场发展情况的指标<sup>[13]</sup>。流动负债与 GDP 之比 ( $di04$ ) 是金融部门发展的总量检测方法<sup>[31]</sup>。关于银行发展情况的指标, 选取银行存贷比 ( $si04$ ) 以及银行税后资产收益率 ( $ei05$ )。从银行盈利角度出发, 银行存贷越高越好, 但从抗风险角度出发, 存贷比例不宜过高, 因为银行需要留有一定的库存现金、存款准备金, 以应付广大客户日常现金支取和结算, 如存贷比过高, 这部分资金就会不足。同时, 我们选取股票总市值与 GDP 之比 ( $dm01$ ) 作为衡量股票市场发展情况的指标, 比值越高表明一国股票市场发展越充分。

### 3. 控制变量

借鉴 Mamun 等的研究<sup>[18]</sup>, 本文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1) 资本形成总额 ( $Inv$ ), 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减去处置的固定资产和存货的净额, 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2)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 $Gov$ ), 包括政府为购买货物和服务 (包括雇员薪酬) 而发生的所有经常性支出, 还包括国防和国家安全方面的大部分支出, 但不包括政府军费支出。(3) 贸易开放度 ( $Openness$ ), 是反映一国 (地区) 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借鉴孙浦阳和武力超、Demirgüç-Kunt 和 Levine 的研究<sup>[32-33]</sup>, 本文使用一国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进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衡量贸易开放度。(4) 技术进步 ( $Tec$ ), 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重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技术进步水平。(5) 人口规模 ( $Pop$ ), 以取对数形式的人口数量表示。(6) 外商直接投资 ( $Fdi$ ), 以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水平占 GDP 比重来衡量。

### 4. 工具变量

劳工汇款将对接收国的劳动生产率造成影响, 同时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可能吸引更多的劳动汇款流入, 这种双向因果关系会导致潜在内生性问题。鉴于此, 本文选取接收国交易成本 ( $cost$ ) 和滞后期的劳工汇款 ( $L.remit$ ) 作为工具变量, 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降低回归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一方面, 接收国交易成本降低, 为劳动汇款的流入提供了更加良好宽松的环境, 使得劳工汇款数量增加; 另一方面,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不会随着接收国交易成本的提高或降低而产生明显变化, 故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假设。具体变量定义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列表

变量类别	变量名称	符号	变量描述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i>LP</i>	按 2005 年不变价格计算并经人均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	PWT 数据库
	劳工汇款	<i>Remit</i>	个人收到的劳工汇款占 GDP 的比重(%)	WDI 数据库
解释变量	流动负债与 GDP 之比	<i>di04</i>	流动负债/GDP(%)	GFDD 数据库
	股票总市值与 GDP 之比	<i>dm01</i>	股票总市值/GDP(%)	GFDD 数据库
	银行税后资产收益率	<i>ei05</i>	银行税后收益/总资产(%)	GFDD 数据库
	银行存贷比	<i>si04</i>	银行贷款/银行存款(%)	GFDD 数据库
	资本形成总额	<i>Gov</i>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占 GDP 比重(%)	WDI 数据库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i>Inv</i>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占 GDP 比重(%)	WDI 数据库
	控制变量	贸易开放度	<i>openness</i>	进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
工具变量	技术进步	<i>Tec</i>	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制造业产品出口的比重(%)	PWT 数据库
	人口规模	<i>Pop</i>	人口数量取对数	WDI 数据库
	外商直接投资	<i>Fdi</i>	FDI 净流入占 GDP 比重(%)	WDI 数据库
	交易成本	<i>Cost</i>	接收国交易成本	WDI 数据库
	劳工汇款滞后项	<i>L. remit</i>	劳工汇款( <i>remit</i> )的滞后一期变量	WDI 数据库

## 五、实证结果及讨论

### (一) 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表 2 展示了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影响的回归结果。表 2 中,我们依次选取流动负债与 GDP 之比(*di04*)、股票总市值与 GDP 之比(*dm01*)、银行税后资产收益率(*ei05*)以及银行存贷比(*si04*)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各金融发展指标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从不同维度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均对本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一方面,金融发展影响技术进步。金融体系规模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还能帮助创新主体分散风险,进而提高创新研发的成功率,极大推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另一方面,金融发展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及回报率。金融市场如股票市场的扩展集聚了大量的市场参与者,有利于有效信息的充分整合,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搜集和筛选信息的成本,从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收益率。而金融中介效率的提升能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市场预期好、投资效益高且资金需求量大的领域,从整体上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进一步促进本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表 2 可知,劳工汇款确实会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与 Barai、Mamun 等的实证研究结论一致<sup>[17-18]</sup>。由此,假设 1 得到支持。

### (二) 金融发展的调节效应

我们分别引入四个金融发展指标与劳工汇款的交互项,通过分析交互项对劳工汇款影响接收国劳

表 2 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面板固定效应)

	(1)	(2)	(3)	(4)
<i>remit</i>	0.053 *** (0.005)	0.081 *** (0.005)	0.058 *** (0.006)	0.054 *** (0.006)
<i>di04</i>	1.520 *** (0.085)			
<i>dm01</i>		0.358 *** (0.015)		
<i>ei05</i>			0.353 *** (0.032)	
<i>si04</i>				0.361 *** (0.053)
<i>inv</i>	0.171 ** (0.080)	0.127 * (0.067)	0.104 (0.111)	0.311 *** (0.085)
<i>gov</i>	0.911 *** (0.064)	0.901 *** (0.056)	0.989 *** (0.092)	1.069 *** (0.067)
<i>openness</i>	0.202 *** (0.057)	0.295 *** (0.044)	0.284 *** (0.074)	0.015 (0.058)
<i>tec</i>	0.018 *** (0.002)	0.008 *** (0.001)	0.015 *** (0.002)	0.019 *** (0.002)
<i>pop</i>	0.120 *** (0.015)	0.213 *** (0.013)	0.081 *** (0.021)	0.095 *** (0.016)
<i>fdi</i>	0.044 ** (0.017)	0.010 (0.015)	0.157 *** (0.027)	0.037 ** (0.019)
<i>constant</i>	2.626 *** (0.525)	10.794 *** (0.421)	6.627 *** (0.662)	5.551 *** (0.519)
N	2203	1755	1507	2235

注:被解释变量是劳动生产率(*lp*);括号内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动生产率传导机制的作用,以全面地展现不同维度的金融发展状况在调节上述传导机制中的差异性效应。表3和表4的回归结果显示,引入交互项后,不论是使用固定效应模型还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劳工汇款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劳工汇款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的结论依然稳健。

在固定效应模型中,各金融发展指标和劳工汇款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发展通过与劳工汇款的互动作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假设2得到支持。除了以流动负债与GDP之比(*di04*)衡量金融部门总体发展情况的模型(1),在模型(2)至模型(4)中,银行存贷比(*si04*)与劳工汇款交互项的系数值较大,在一定程度上证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对劳工汇款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传导机制影响更大。劳工汇款的接收国多是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的金融自由化程度相对较低,银行贷款成为企业外源融资的主要来源,因此银行存贷比与劳工汇款的互动作用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更大且更显著。

表4报告了使用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相比于表3展示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基于工具变量进行回归的模型(1)—(4)的回归系数发生了微小的变化,但总体的分析结论与固定效应模型下一致。同时,Sargan检验值均大于0.1,没有拒绝原假设,表明本文的工具变量设定合理,未过度识别。在克服了内生性问题可能存在的影响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此外,不论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还是固定效应模型方法,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是正的,且绝大多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所选择的控制变量对劳动生产率都具有正向影响。

(三) 区分金融发展总体水平的分组检验

由于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接下来本文将基于接收国交易成本和滞后期的劳工汇款两个工具变量,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分析。在表4基础上,本文将样本国家分成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等水平和低于中等水平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具体如表5所示。基于四个维度金融发展指标的分组回归均通过Sargan检验。

1. 劳工汇款(*remit*)的回归系数方面。从系数的显著性来看,在以流动负债占GDP之比与股票总市值占GDP之比来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模型中[第(1)—(4)列],劳工汇款对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国

表3 金融发展对劳工汇款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关系的调节效应 (面板固定效应)

	(1)	(2)	(3)	(4)
<i>remit</i>	0.760*** (0.104)	0.063*** (0.012)	0.069*** (0.006)	0.215*** (0.042)
<i>di04</i>	2.023*** (0.105)			
<i>di04 × remit</i>	0.184*** (0.023)			
<i>dm01</i>		0.372*** (0.017)		
<i>dm01 × remit</i>		0.005*** (0.002)		
<i>ei05</i>			0.448*** (0.037)	
<i>ei05 × remit</i>			0.031*** (0.006)	
<i>si04</i>				0.575*** (0.061)
<i>si04 × remit</i>				0.062*** (0.01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0.319 (0.594)	10.746*** (0.422)	6.725*** (0.655)	4.512*** (0.537)
N	2203	1755	1507	2235

表4 金融发展对劳工汇款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关系的调节效应 (面板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1)	(2)	(3)	(4)
<i>remit</i>	0.123*** (0.023)	0.005*** (0.002)	0.004* (0.002)	0.020* (0.011)
<i>di04</i>	0.223*** (0.030)			
<i>di04 × remit</i>	0.027*** (0.005)			
<i>dm01</i>		0.089*** (0.006)		
<i>dm01 × remit</i>		0.002** (0.001)		
<i>ei05</i>			0.004 (0.006)	
<i>ei05 × remit</i>			0.004*** (0.001)	
<i>si04</i>				0.185*** (0.014)
<i>si04 × remit</i>				0.005** (0.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2.056*** (0.661)	0.652 (0.831)	4.447*** (1.127)	0.211 (0.632)
Sargan 检验	0.314	0.442	0.217	0.349
N	2203	1755	1507	2235

注: Sargan 检验报告的是对应P值。

家的劳动生产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当以银行税后资产收益率和银行存贷比作为金融发展指标时[第(5)一(8)列],劳工汇款对于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金融发展水平低于中等水平的国家样本中并不显著,说明劳工汇款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论在金融发展总体水平存在差异的国家中稳健。但正如前文所述,劳工汇款的接收国多是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达水平较低,银行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劳工汇款对于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因此,以银行税后资产收益率和银行存贷比衡量的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从系数的数值来看,在金融发展总体水平高于中等水平的样本中,劳工汇款回归系数数值较大,表明劳工汇款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受到国家金融发展总体水平的影响。

2. 金融发展指标与劳工汇款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方面。在金融发展水平高于中等水平的国家样本中,各金融发展指标与劳工汇款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低于中等水平的国家样本中,交互项系数虽为正但不显著,表明接收国总体金融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影响金融发展与劳工汇款交互项对于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因此,劳工汇款接收国应改善本国的金融环境,提高金融部门的成熟度,更好地运用劳工汇款来促进本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进而刺激国民经济高效平稳发展。

表 5 区分金融发展水平的分组回归结果

	(1) Above	(2) Below	(3) Above	(4) Below	(5) Above	(6) Below	(7) Above	(8) Below
<i>remit</i>	0.106 *** (0.022)	0.060 ** (0.028)	0.022 ** (0.009)	0.008 ** (0.004)	0.007 * (0.004)	0.006 (0.004)	0.033 ** (0.016)	0.015 (0.011)
<i>di04</i>	1.217 *** (0.213)	0.157 *** (0.029)						
<i>di04 × remit</i>	0.024 *** (0.005)	0.014 (0.050)						
<i>dm01</i>			0.098 *** (0.015)	0.071 *** (0.008)				
<i>dm01 × remit</i>			0.008 *** (0.002)	0.003 (0.002)				
<i>ei05</i>					0.051 ** (0.023)	0.013 (0.008)		
<i>ei05 × remit</i>					0.002 ** (0.001)	0.001 (0.001)		
<i>si04</i>							0.199 *** (0.026)	0.187 *** (0.032)
<i>si04 × remit</i>							0.004 *** (0.001)	0.003 (0.00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8.757 *** (1.161)	5.335 *** (0.841)	4.653 *** (1.079)	2.689 ** (1.098)	4.285 ** (1.712)	2.614 (1.660)	0.752 (0.989)	0.148 (0.713)
Sargan 检验	0.451	0.272	0.551	0.363	0.217	0.238	0.279	0.513
N	1343	860	702	1053	719	788	1258	977

注:above 表示金融发展高于中等水平的国家样本,below 表示金融发展低于中等水平的国家样本;Sargan 检验报告的是对应 P 值。下表同。

(四) 区分劳工汇款规模的分组检验

为探究劳工汇款是否越多越好,本文将样本国家按所接收劳工汇款的规模是否高于中等水平进行分组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Sargan 检验值表明无法拒绝工具变量是合适的这一原假设。

首先,表 6 中劳工汇款(*remit*)的回归系数大多显著为正,且在劳工汇款规模高于中等水平的国家样本中劳工汇款的回归系数明显低于其他国家样本回归中得到的数值,表明随着劳工汇款数量的增加,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这与 Batu 的研究结论“短暂性的劳工汇款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而持久性的劳工汇款增加对经济增长不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相类似<sup>[14]</sup>。同时家庭还会将大部分的劳工汇款收入用于消费而非储蓄投资,使得劳工汇款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效应削弱。

其次,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方面,以股票总市值占 GDP 之比衡量金融发展水平、以劳工汇款规模高于中



等水平的国家为样本[第(3)列]的回归中,金融发展与劳动汇款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可能因为大部分接收国的股票市场发展时间较短,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体系为主,以发行股票等方式为主的直接融资体系处于被动发展期,相关法规、监管框架、市场环境尚不成熟。因此,在劳工汇款过高的环境下,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其余维度衡量金融发展的指标与劳工汇款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总体上接收国金融发展水平和劳工汇款的交互作用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推进力。

最后,在劳工汇款规模高于中等水平的国家样本中,四个不同维度金融发展指标的回归系数都小于在劳工汇款规模低于中等水平的国家样本中所得到的值。随着劳工汇款数量的增加,金融发展所发挥的促进作用减小,原因可能是:当劳工汇款规模较小时,用于储蓄的劳工汇款比例更高,金融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储蓄向投资的有效转化<sup>[24]</sup>;当劳工汇款规模超过一定水平,储蓄不再随劳工汇款增加而增加,而是更多地将劳工汇款用于消费休闲等商品,从而对金融体系转化储蓄的要求降低。

表6 区分劳工汇款规模的分组回归结果

	(1) Above	(2) Below	(3) Above	(4) Below	(5) Above	(6) Below	(7) Above	(8) Below
<i>remit</i>	0.147*** (0.021)	0.234** (0.106)	0.003 (0.003)	0.036* (0.021)	0.003 (0.002)	0.059** (0.029)	0.028** (0.012)	0.215*** (0.073)
<i>di04</i>	0.156*** (0.038)	0.177*** (0.048)						
<i>di04 × remit</i>	0.032*** (0.005)	0.049** (0.023)						
<i>dm01</i>			0.028*** (0.009)	0.088*** (0.011)				
<i>dm01 × remit</i>			0.002 (0.001)	0.013* (0.007)				
<i>ei05</i>					0.001 (0.011)	0.007*** (0.003)		
<i>ei05 × remit</i>					0.003*** (0.001)	0.028*** (0.002)		
<i>si04</i>							0.111*** (0.022)	0.149*** (0.026)
<i>si04 × remit</i>							0.006** (0.003)	0.050*** (0.01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Constant</i>	1.543* (0.789)	0.228 (1.018)	0.738 (0.981)	4.109*** (1.339)	4.924*** (1.392)	7.215*** (1.684)	0.649 (0.762)	0.903 (0.988)
Sargan 检验	0.372	0.336	0.431	0.481	0.282	0.251	0.368	0.363
N	1016	1187	708	1047	743	764	1047	1188

(五) 考虑金融危机影响的回归结果

由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势必会影响到各国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可能对本文的结论造成影响,因此我们进一步引入金融危机(*crisis*)这一时间虚拟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2008年以前 *crisis* 取值为0,2008年及以后取值为1,再次回归(篇幅所限,回归结果此处从略,备索)。从四个维度衡量金融发展水平的回归模型均通过 Sargan 检验,再一次证明了本文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引入金融危机变量后劳工汇款回归系数的数值仍然显著为正,同时金融发展指标和劳工汇款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表明考虑金融危机的外生冲击后,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基于142个国家1980—2017年的面板数据,围绕“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否对劳工汇款作用于接收国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这一问题展开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1)劳工汇款和金融发展可以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金融发展通过与劳工汇款的互动作用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中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对劳工汇款促进劳动生产率增长的传导机制的影响更大。(2)劳工汇款对金融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受接收国金融发展总体水平的影响,此外,金融发展与劳工汇款交互作用对于接收国劳动生产率的作用也受其影响。金融发展总体水平高于

中等水平的国家所接收的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的贡献更大,金融发展对劳工汇款促进接收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传导机制的促进作用更明显。(3)劳工汇款并非越多越好,随着劳工汇款数量的增加,劳工汇款和金融发展对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都有所减弱。总体上接收国金融发展水平和劳工汇款的交互作用对劳动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推进力。(4)考虑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后,本文的回归结果仍然稳健,这也从侧面反映金融发展并不是金融危机的根源,相反,金融发展拓宽作为资本需求方的企业的融资渠道,会降低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难度。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得出如下启示:首先,各国应努力为劳工汇款提供便捷、高效并且经济的汇付渠道,保证劳动汇款从官方渠道流入,并吸引更多劳工汇款。其次,各国应致力于不断优化本国的金融市场发展规模、提高金融部门的成熟程度、完善信贷市场以及有节奏地跟上金融开放的浪潮,从而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增强本国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力,以期通过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进一步促进劳工汇款对劳动生产率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银行对金融体系融资效率的影响仍占据主导地位,其作用不可替代。最后,随着近年来经济增速下滑,供需错配挑战加剧,我国应充分认识到劳工汇款在减少国家富余劳动力、带来汇款收入的同时,还具有为企业研发提供资金支持、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企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作用<sup>[34]</sup>。我国政府应重视教育投入,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从而提高跨国劳工的竞争力;同时应大力完善基础设施,并在企业创业初期推行税收减免政策,降低一些制度性交易成本,从而为劳工汇款提供更多的投资机会,以更加高效地使用劳工汇款。

### 参考文献:

- [1] Lucas R E B, Stark O. Motivations to remit: evidence from Botswan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5, 93(5):901-918.
- [2] 曹如中, 戴昌钧, 贺团涛. 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J]. *科学经济社会*, 2008(1):61-63.
- [3] 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 [4] 梁琪, 滕建州. 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总量结构变化及因果关系研究[J]. *经济研究*, 2006(1):13-24.
- [5] Demirgüç-Kunt A, Córdova E L, Pería M S M, et al. Remittances and banking sector breadth and depth: Evidence from Mexico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1, 95(2):229-241.
- [6] El-Sakka M I T, McNabb R. The macr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emigrant remittances[J]. *World Development*, 1999, 27(8):1493-1502.
- [7] Adams R H. The determinants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1):93-103.
- [8] Edwards A C, Ureta M.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mittances, and schooling: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r[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3, 72(2):429-461.
- [9] 崔兆财, 张志新, 高小龙. 国际移民汇款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系统 GMM 分析[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15(5):20-28.
- [10] Lopez-Calix J, Seligson M. Small business development in El Salvador: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R].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Washington, 1990.
- [11] Quartey P, Blankson T. Do migrant remittances reduce the impact of macro-volatility on poor households in Ghana? [R]. Final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Global Development Network, 2005: 223-236.
- [12] Catrinescu N, Leon-Ledesma M, Piracha M, et al. Remittances,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growth[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1):81-92.
- [13] 武力超. 国外资本的流入是否总是促进经济增长[J]. *统计研究*, 2013(1):53-60.
- [14] Batu M. International worker remittanc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Real Business Cycle framework [J]. *Structural Change & Economic Dynamics*, 2017, 40(Mar.):81-91.
- [15] Rao B B, Hassan G M. Are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growth effects of remittances significant? [J]. *World Economy*, 2012, 35(3):351-372.
- [16] Bayangos V, Jansen K. Remittances and competitiveness: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J]. *World Development*, 2011, 39(10):1834-1846.
- [17] Barai M K. Development dynamics of remittances in Bangladesh[J]. *SAGE Open*, 2012, 2(1):1645-1669.

- [18] Mamun M A, Sohag K, Uddin G S, et al. Remittance and domestic labor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remittance recipient countries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5, 47:207-218.
- [19] Mundaca B G. Remittances, financial market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J]. *Review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9, 13(2):288-303.
- [20] Dramane C. Remittances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Sub-Saharan African countries: A system approach [J]. *Economic Modelling*, 2015, 45:249-258.
- [21] Akobeng E. Out of inequality and poverty: Evidence for the effectiveness of remittances in Sub-Saharan Africa [J].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2016, 60:207-223.
- [22] 高帆. 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及其因素分解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07(4):20-27.
- [23] Levine R. Stock markets, growth, and tax policy [J]. *Journal of Finance*, 1991, 46(4):1445-1465.
- [24] 韩廷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科学*, 2001(3):31-40.
- [25] 沈坤荣, 孙文杰. 投资效率、资本形成与宏观经济波动——基于金融发展视角的实证研究 [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6):52-63.
- [26] Borraz F.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remittances on schooling: The Mexican experience [J]. *Global Economy Journal*, 2005, 5(1):32.
- [27] Dehejia R H, Gatti R. Child labor: the ro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income variability across countries. [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2005, 53(4):913-931.
- [28] Beegle K, Dehejia R H, Gatti R. Child labor and agricultural shocks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6, 81(1):80-96.
- [29] 吴进红, 张为付. 劳动生产率不同计算方法的现实意义 [J]. *生产力研究*, 2003(4):111-113.
- [30] Polemis M L, Stengos T. Does market structure affect labour productivity and wages? Evidence from a smooth coefficient semiparametric panel model [J]. *Economics Letters*, 2015, 137(12):182-186.
- [31] King R G, Ross L. Finance and growth: 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 [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3):717-737.
- [32] 孙浦阳, 武力超.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基于政府治理差异的视角 [J]. *当代经济科学*, 2011(2):43-52.
- [33] Demirgüç-Kunt A, Levine R. Finance and inequ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J]. *Annual Review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9, 1(1):287-318.
- [34] 张燕生. “十三五”:全面深化新一轮改革开放 [J]. *中国外汇*, 2015(3):16-18.

[责任编辑:黄燕]

## Labor Remittance and Improv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A Research on the Regulatory Effect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WU Lichao, LIN Lan, HE Chunhui, ZHUO Wenkang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expounding of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level on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of labor remittance in recipient countries,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42 countries from 1980 to 2017 and using the fixed effects model and two-stage least squares method (2SLS),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research with the focus on “whether the differences i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ffects the mechanism of labor remittances to the recipient countries’ labor productiv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labor remittance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in the receiving country. But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amount of labor remittance, the role of labor remittance in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productivity is weakened. The higher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 greater the extent to which remittances promote the labor productivity in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the greater the impact the banking-oriented financial system has on labor remittance promoting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ddition, after considering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crisis, our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is article remain robust. Final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how to use labor remittances reasonabl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labor remittance; labor productivity; financial development; financial crisis; technological progress;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foreign labor service cooperation; human capital